

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培通

(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市 300071)

摘要:恩格斯青年时期在完成自身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从物质利益出发,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诉诸于抽象原则,使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表现出了基督教国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人对物的异化,使金钱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才会获得一致,人类才会重新掌握自己。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完成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必然要以社会革命为依归。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创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青年恩格斯;物质利益;批判;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1-0082-05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是对马克思哲学和恩格斯哲学的分别研究,其中的主要原因越来越不是回应所谓“马恩对立论”的需要,而是在很多学者看来,只有通过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和恩格斯哲学之间差异性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这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马克思哲学和恩格斯哲学无论具有怎样的一致性,由于其体现的是两个独立主体的思想,这种差异就必然是存在的,因此,研究这种差异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可问题在于,在进行这种研究的过程中,有一种声音不容忽视,那就是总想借助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否定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真正内涵,其实是想用“马克思哲学”来取代人们惯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从表象上看,这无非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恩格斯哲学作另案处理,而实质却是根本否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要清除恩格斯哲学思想影响的意味,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体现的是两位经典作家的共同理想,凝聚着他们的共同智慧。所以,单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专门研究马克思哲学或恩格斯哲学都

不成什么问题,但用其中的任何一种研究来取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轨道。

诚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作更加深入的挖掘,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淡化对恩格斯思想的关注。其实,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解释工作之外,还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学界注意,并且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是集中于晚期,特别是体现在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著作的论说当中,而对于其早期思想,特别是1844年与马克思开始革命合作之前思想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表明,就是在这个时期,恩格斯从不同于马克思的道路走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门槛。奥古斯特·科尔纽曾经指出:“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分析,恩格斯完全独立于马克思并在与马克思不同的领域里,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带来了非常重大的贡献。”^[1]我们知道,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的,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却是在实际接触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

* 收稿日期:2006-05-26

作者简介:王培通(1972-),男,河北沧县人,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

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2]9}。本文将通过解读相关文本,循着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心路历程,说明他在完成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为创立新世界观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青年恩格斯对社会物质利益的关注

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恩格斯在居留英国期间,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自身的“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有学者通过对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研究认为,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注意到的物质利益,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存在根本不同,而且,恩格斯所转向的共产主义还具有“哲学共产主义”的性质,其依据主要是恩格斯早期曾经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的确,恩格斯从1839年起,就用很多时间研究过哲学和批判神学,他在1839年4月底给他的同学格雷培的信中说:“我目前正忙于研究哲学和批判的神学。”^[3]1841年11月下旬至1842年初,恩格斯还曾经接连写出过批判谢林哲学的三篇檄文:《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1841年下半年,他又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因此,在恩格斯的思想演进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这些思想倾向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些思想的信徒。事实上,自从1842年11月到达曼彻斯特以后,恩格斯就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因就是对于现实的社会物质利益的关注。

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回顾了他青年时期在考察英国社会时所揭示的社会物质利益的作用。他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他接着指出:“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4]由此可见,恩格斯1842年到达英国后所注意到的物质利益对社会生

活的影响,在他思想的发展中具有多么大的作用,而且为最终创立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具有怎样的影响。那么,恩格斯究竟是如何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考察当时作为资本主义典型代表的英国社会的呢?就是借助原则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在阅读恩格斯早期文本的过程中我们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原则”和“利益”是这个时期恩格斯使用频率极高的两个字眼,而他正是借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

第一,物质利益要对社会历史发生作用,就必然要发展为原则。恩格斯到英国后不久发表在《莱茵报》1842年12月9日和10日的《国内危机》,对利益和原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他指出:“英国本国的实践即物质利益”固然重要,但“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也就是说,物质利益要想对历史进步产生影响,就必须诉诸于相应的原则,物质利益对于原则具有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强调,如果只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忽略唤起人们投入运动的“思想”,就是“受了表面现象的迷惑而忘记了实质”,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5]546-547}。

第二,原则不能离开利益而独立存在,剥离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就只能抽象的原则,而抽象原则在政治上是无所建树的。恩格斯在1843年10月下旬写就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在分析德国的社会改革运动时指出,德国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因此,“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5]592}。

第三,原则与利益可以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在写于1844年2月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把英国式的社会革命同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和德国式的哲学革命进行了对比后认为,“只有在英国,纯粹作为个人、有意识地不代表普遍原则的人们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之接近完成。只有在这里,群众才是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进行活动的群众;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有所影响必须先转化为利益”^{[5]661-662}。

恩格斯青年时期对原则与利益关系的考察,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后来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高度,但足以说明,他这时已经根本摆脱了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影响,走出了创立新世界观的关键一步。这正像恩格斯后来在《反社

林论》中指出的：“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8]

二、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

恩格斯青年时期完成的“两个转变”是交互进行的，在他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同时，在思想上也正经历着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后者是在考察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完成的。

首先，恩格斯在对以弘扬理性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进行抨击的基础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理性主义的虚伪面纱之下，却恰恰背离了人类真正的理性。他这样写道：“消灭了封建制度，实行了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了理性，实际上是使非理性真正到了顶点，从外表看来，农奴制像是已被消灭，实际上它只是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而已。”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首先宣布，人类的联合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调，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但就其实质而言，“虽然这样一来它把国家否定了，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为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并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毫无内容并失掉了一切意义的国家以向前发展的力量。”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发展的顶点”^{[5]663}。

其次，恩格斯通过批判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英国宪法这个“英国理性的最完善的产物”（照托利党的说法）的虚伪性，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阶级本质和局限性。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曾经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或者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神学）。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5]576} 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中，恩格斯接着指出：“如果说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也是在于人类对自身的

恐惧，那么，在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家里，这种恐惧达到最高点。”^{[5]681} “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原因在于，“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所以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只是一个过渡，只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需要加以试验，但从其中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现行政治范围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5]705}。

再次，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恩格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很多研究者都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他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典范，其实，恩格斯稍后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结合对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分离状态也就是基督教的主观性原则的最终结论，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发展的顶点。”所以，“只要异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隶制的消灭使‘现金交易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因此，财产——这是天然的、冷酷无情的准则，和人类应有的合乎人性的准则正相对立——就被捧上宝座”。恩格斯指出，“为了完成这种异化，金钱——财产的异化了的空洞的抽象——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这时“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恩格斯最后强调：“基督教国家只是国家这种机构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消灭，国家这种机构也必然要消灭。”“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5]663—664} 恩格斯指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利益的共同”才会成为“基本原则”，那时“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14]。

三、恩格斯早期社会革命思想的提出

社会革命思想是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批判

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科学共产主义区别于其他空想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恩格斯就曾经得出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并且强调:“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5]575}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恩格斯在分别研究英、法、德三国的情况后指出,共产主义学说在这三个国家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5]575-576}恩格斯指出,“英国发生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他因此强调指出,“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5]656}

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式,恩格斯明确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在批判宪章派的“合法革命”思想时明确指出:“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他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恩格斯指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5]550}恩格斯同时强调:“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5]550-551}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提纲性文件《共产主义原理》中承袭了这一思想,在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恩格斯指出:“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

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20]

恩格斯还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质力量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日益富庶的同时,却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的无产者阶级。他指出:“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无产阶级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指明了其历史地位。他接着指出,这个阶级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因为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挨饿,而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整个阶级都要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5]549}。在1843年5、6月间撰写的《伦敦来信》中,恩格斯继续指出,社会主义一般是在资产阶级下层和无产者中间征集自己的拥护者,因为,“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的意义来说),它就愈进步,愈有远大的前途——这一情况是非常显著的”^{[5]560-561}。这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质承担者的思想,而且已经涉及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先进性问题。当然,恩格斯在这里由于缺乏对生产力因素的考察,还不能从根本上阐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但他却因此成为在科学共产主义史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第一人。

四、结语:对创立新世界的意义

客观地讲,恩格斯早期从社会物质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虽然已经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对社会革命思想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阐述,但由于恩格斯自身还处于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新的世界观还没有最终确立起来,因此,他还不能够系统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甚至在语言的使用上还时常带有旧哲学的印迹。尽管如此,恩格斯早期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却是十分宝贵的,它不仅使恩格斯在同时代思想家中脱颖而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而与马克思走到了一起,甚至先于马克思深入到经济领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对于他们创立新世界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所注意到的社会

物质利益是与社会中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特别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这与他们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确立的“现实的人”的出发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人类历史的物质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3]恩格斯早期注意到的物质利益,可以说是“现实的个人”在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活动的根本动因。

第二,恩格斯早期对于物质利益的揭示,为马克思科学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在回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说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最终得到结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9}

第三,恩格斯把社会物质利益与人类自身解放结合起来,对无产阶级的处境不是仅仅寄予道义上的同情,而是看到他们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的身上。这说明,恩格斯青年时期在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勇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改变世界”为根本宗旨的革命精神,也为他们后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0:13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6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47.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6.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责任编辑 刘荣军

On Engels'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in His Early Times and Its Significance

WANG Pei-t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ngels criticized capitalism drastically based on material interests when he underwent the change of his world view in his youth. He thought that capitalistic state show itself as a Christian one, for bourgeois liberalism resorts to abstract principles.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engenders human dissimilation to object, which makes money become the regnant power of society. Only in communist society can common interests and private interests be consistent, and people predominate themselves again. We must rely on social revolution when we try to replace capitalistic private ownership and rebuild our society. Engels'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in his early times is good to build Marxist world view and can help us to grasp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Engels in his youth; material interests; criticize; capitalism